

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

魏 冰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组建“联合阵线”的形式发动过多次海外军事行动,但作为美国的核心盟友,北约国家的参与情况却存在巨大差异。本文认为,对地区和全球地位的追求是北约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全球地位包括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国内政治因素则会对其作用过程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限制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在利比亚战争中,法国在地区地位和国际声誉的驱动下积极参与行动,并做出重要贡献;德国作为法国的竞争对手,在联合行动有助于扩大法国在北非和欧盟影响力而无助于自身地位提升的情况下,结合国内民众反对军事干涉的态度,最终选择不参与;土耳其则在安全威胁较弱的情况下,基于地区地位、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的考虑选择参与行动,但民众的反对态度使其仅做出弱贡献。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行为选择也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关键词:美国 北约 军事行动 “联合阵线” 地位追求

一 引言

2019年7月,美国倡议组建“波斯湾护航联合阵线”(Persian Gulf maritime coalition)以应对伊朗的威胁,并邀请其盟友参加。但截至目前,美国的北约主要盟友中仅有英国加入,德国和法国明确拒绝美国的邀请,认为此举无助于缓和波斯湾地区紧张局势,加拿大等国则仍在观望。^①事实上,北约国家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在冷战后美国发起的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德国未参加伊拉克战争

^{*} 感谢《欧洲研究》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本文曾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五届博士生论坛上宣读。文责自负。

^① 《美国力组波斯湾“护航联盟”,盟友各有何种不同考量?》,澎湃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22998;一些英文概念如“alliance”“coalition”“union”和“association”都被译为“联盟”,基本上忽略了它们在英文语境中的具体差异。在本文中,“coalition”翻译为“联合阵线”,以示与强调军事义务和承诺的“联盟”相区别。

和利比亚战争,在海湾战争中也主要提供经济支持,没有做出有效的军事贡献;法国和加拿大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相比之下,英国始终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参与了所有军事行动并做出重要贡献。从联盟理论的角度看,在不对称联盟中,主导国为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成员国以支持主导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作为交换。^①然而,作为美国级别最高的盟友,北约国家在历次行动中的行为选择却存在巨大差异,部分国家甚至多次拒绝参与。那么,北约国家对美国发起的海外军事行动的行为选择遵循什么逻辑?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开展的重大军事行动都采用了“军事联合阵线”(military coalition)这种形式。“联合阵线”是国际政治中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是“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在特定时期就具体议题采取共同立场和行动而结成的联合”。^②与联盟(alliance)相比,联合阵线具有四个显著特征:第一,非正式性。联盟是国家间正式的合作安排,联合阵线一般是非正式的合作,不具备强制约束力。第二,多领域。联盟聚焦于安全领域,联合阵线则能覆盖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第三,针对性。联盟框架下的合作相对而言覆盖面更广,而联合阵线仅限定为特定的安全事件,通常不会超出这一事件的合作范围。第四,暂时性。联盟的正式性保障其具备较长的存续时间,联合阵线则以具体事件为依托,通常随事件的终结而解散,不过相比军事联合阵线,低政治领域的联合阵线一般存在时间更长。^③

联合阵线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具备明显的优势,主要包括:第一,通过拉拢尽可能多的国家,有效提升己方实力,以应对单个国家难以对抗的威胁;第二,多个国家参与行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对手的军事力量,并充分发挥各个国家的军事优势,共享彼此的战略资源,以提升行动胜利的可能性;第三,参与国数量的增加能够强化行动的合法性,为行动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第四,更多国家的参与也能帮助主导国分摊行动的成本,减少各国在行动中的损失。尽管如此,一些内在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联合阵线的作用。第一,由于参与国众多,作战指挥权的归属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动的效果;第二,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政治目的存在较大差异,这会增加作战过程中的协调成本;第三,参与国在语言及武器装备上差异巨大,使得联合作战难度加

^①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904-933.

^② 刘丰:《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59页。

^③ 关于联合阵线的特征,参见 Thoma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8, No.1, 2012, pp.63-65; Cenap Çakmak, "Coalition Building in World Politics: Definitions, Conceptions, and Examples," <http://sam.gov.tr/wp-content/uploads/2012/02/CenapCakmak.pdf>; 刘丰:《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第58-61页。

大;第四,集体行动的过程中难以避免“搭便车”的困境。^①

美国之所以热衷组建联合阵线,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巨大的优势。虽然不可避免会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仍然比联盟的作战形式更加有效。其他国家是否参与则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对北约集体防御的区域范围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包括所有缔约国的领土、北回归线以北的北大西洋地区所有缔约国管辖的岛屿,以及驻扎或通过该区域的所有缔约国军队、船舶或飞机。^②但冷战后美国发起的多数军事行动均在这一区域之外,换言之,北约国家是否参与行动与北约的联盟承诺不存在直接关系。在不受联盟承诺约束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北约国家自愿参与美国组建的军事联合阵线,有的国家则拒绝参与?为什么有的参与国在行动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参与国则仅仅象征性地提供帮助?本文将集中回答上述问题。

二 关于联合阵线的研究成果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关于联合阵线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动因;二是参与国在联合阵线行动中的行为差异。

(一) 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动因

关于国家为何参与联合阵线,学界已进行充分的探讨,总体上区分了体系、双边和单元三个层次。体系层次上,既有研究主要从国际地位、威胁程度和行动合法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国家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考量会推动其参与联合阵线。对于大国而言,一方面,自身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在行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加入联合阵线有利于巩固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大国往往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广泛的国家利益,参与联合阵线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国家利益。此外,大国地位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参与国际行动的责任。^③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受到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类国家难以通

^① 关于联合阵线的优势与劣势,参见 Daniel S. Morey, “Military Coalitions and the Outcome of Interstate War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2, No.4, 2016, pp.535-538; Sarah E. Kreps, “The 1994 Haiti Intervention: A Unilateral Operation in Multilateral Clothe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0, No.3, 2007, pp.452-454; Patricia A. Weitsman, “Wartime Alliances versus Coalition Warfare: How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Matters in the Multilateral Prosecution of War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4, No.2, 2010, pp.113-138; Bradley F. Podliska, *Acting Alone: A Scientific Study of American Hegemony and Unilateral Use-of-Force Decision Making*, Lexington Books, 2010, pp.34-42; 刘丰:《联合阵线与美国军事干涉》,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33-36页;刘丰:《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第65-66页。

^②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rticle 6,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

^③ Renato Corbetta and William Dixon, “Multilateralism, Major Powers, and Militarized Disput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57, No.1, 2004, pp.5-14.

过增强综合国力来提升国际地位,因此偏好深入参与国际事务来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进而提升国际地位。^①其次,安全事件对参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程度也会影响其参与意愿。如果国家利益受影响较大,该国参与联合阵线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威胁程度主要可从三个维度进行观测:一是与被干涉地区的地理邻近性,一般而言,距离被干涉地区更近的国家更可能参与联合阵线;二是本国在被干涉地区的海外利益规模,规模越大的国家,其利益受损的程度越高,因而更有意愿参与行动以维护本国利益;三是行动打击目标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行动,对恐怖主义威胁感知越强的国家,越可能参与行动。^②最后,行动是否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也会影响国家参与的意愿。由于武力的使用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受到极大的约束,而联合国是当前权威性最强的国际组织,得到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符合国际法中的正义标准,因而能够争取到非常广泛的国际和国内支持,国家也更愿意参与这类联合阵线。^③

双边层次主要包括联盟关系、对主导国的经济依赖和主导国收买。联盟关系虽然无法起决定性作用,但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一国与联合阵线主导国签订了联盟协议,则意味着该国需要在特定情况下支持主导国的行动,以换取主导国的安全保障。这种情况在不对称联盟中尤为常见,实力较弱的成员国依靠实力强大的主导国保护其国家安全。作为回报,成员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支持和追随主导国,因此更可能参与主导国组建的联合阵线。^④对主导国的经济依赖是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反向激励因素。当一国对联合阵线主导国形成高度的经济依赖时,如果该国不参与行动,则可能面临主导国的经济报复。为了避免经济上的损失,这类国家更可能参与联合阵线。^⑤

^① Ras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25, No.2, 2018, pp.217-241.

^② Tim Haesebrouck,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ir Strikes Against Islamic State: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4, No.2, 2018, pp.256-257; Justin Massie, "Public Contestation and Policy Resistance: Canada's Oversized Military Commitment to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2, No.1, 2016, pp.48-53; Stephen M. Saideman, "The Ambivalent Coalition: Doing the Least One Can Do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37, No.2, 2016, pp.294-297; A.S.M. Ali Ashraf,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Burden-Sharing: The Case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11, pp.41-44.

^③ Atsushi Tago, "Why Do States Join US-Led Military Coalitions? The Compulsion of the Coalition's Missions and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7, No.2, 2007, pp.179-202; Maki Ikeda and Atsushi Tago, "Winning over Foreign Domestic Support for Use of Force: Power of Diplomatic and Operational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No.2, 2014, pp.303-324; Naoko Matsumura and Atsushi Tago, "Negative Surprise in UN Security Council Authorization: Do the UK and French Vetoes Influence the General Public's Support of US Military Ac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6, No.3, 2019, pp.395-409.

^④ Mats Berdal and Astri Suhrke, "A Good Ally—Norway and 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2001-2014,"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41, No.1-2, 2018, p.65; 刘丰:《联合阵线与美国军事干涉》,第32-33页。

^⑤ Randall Newnham, "'Coalition of the Bribe and Bullied?' U.S. Economic Linkage and the Iraq War Coali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9, No.2, 2008, pp.183-200.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即使美国预期加入的国家最终没有加入联合阵线,美国也不会削减对该国的经济援助。^①

此外,主导国收买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玛丽娜·亨克(Marina E. Henke)对多边军事联合行动中的收买行为进行了考察,她认为,行动发起国为了确保行动的合法性并减小国内的阻力,会通过收买的方式说服其他国家参与行动。亨克区分了收买的两种形式,即承担行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成本以及通过其他议题进行补偿。她还指出,主导国倾向于收买三种国家:第一种是愿意参与行动但自身实力欠缺的国家;第二种是在行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缺乏其参与,行动将变得尤为困难的国家;第三种是希望在行动中谋取利益的国家。^② 在另一项研究中,亨克考察了美国组建军事联合阵线的过程,她认为,其他国家并非主动加入美国主导的联合阵线,而是在美国的外交劝说之下才加入的。美国通过外交联系了解这些国家对联合阵线态度的相关信息,并做出相应的补偿和转移支付,以拉拢这些国家参与行动。^③ 主导国对收买对象的选择也有其特定的偏好。斯科特·沃尔福德(Scott Wolford)考察了主导国选择联合阵线成员的逻辑,他指出,主导国更愿意选择与自己外交政策偏好相近的国家作为联合阵线的成员,因为这种国家提出的补偿较少。同时,主导国更倾向选择实力强大的国家作为联合阵线成员,因为对这种国家的补偿能够换来胜利。如果潜在成员国的军事实力能够保证胜利,那么主导国就不会考虑偏好差异的问题。^④

在单元层次上,既有研究发现,与主导国国家特征的相似性、本国政治体制、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权变更情况等也会影响国家的参与。首先,与主导国在国家特征上存在相似性的国家更可能加入联合阵线。斯尔詹·武切蒂奇(Srdjan Vucetic)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英语文化圈的国家基于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似性,更愿意加入美国主导的联合阵线。^⑤ 多哥淳(Atsushi Tago)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⑥ 其次,特定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可能推动国家加入联合阵线。

^① Atsushi Tago, "Is There an Aid-for-Participation Deal? U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id Policy to Coalition Forces (non)Participan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8, No.3, 2008, pp.379-398.

^② Marina E. Henke, "Buying Allies: Payment Practices in Multilateral Military Coalition-Build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4, 2019, pp.128-162.

^③ Marina E. Henke,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Builds Multilateral Military Coal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1, No.2, 2017, pp.410-424; Marina E. Henke, *Constructing Allied Cooperation: Diplomacy, Payments, and Power in Multilateral Military Coali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④ Scott Wolfor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Coali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56-57.

^⑤ Srdjan Vucetic, "Bound to Follow? The Anglosphere and US-Led 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 1950-2001,"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1, 2010, pp.27-49.

^⑥ Atsushi Tago, "Why Do States Join US-Led Military Coalitions? The Compulsion of the Coalition's Missions and Legitimacy," pp.179-202.

帕特里克·梅洛(Patrick A. Mello)对民主国家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右翼政党执政时,如果议会不具备对使用武力的否决权并且使用武力不受宪法限制,那么政府会推动本国参与联合阵线;而如果宪法规定使用武力需要得到议会批准,那么议会中的政党派别实力对比将决定国家是否参与行动。^①最后,国家的政权变更情况同样会影响其对联合阵线的参与情况。由于联合行动的胜利能增强现任政府的权威,因此面临政权危机的领导人更可能组建和参与联合阵线。^②

(二)影响联合阵线行动中行为差异的因素

参与国在联合阵线中的行为差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责任分摊(burden-sharing),涉及国家贡献水平的差异和承担行动类型的不同;二是军队行动范围的差异。关于联合阵线中的责任分摊,阿里·阿什拉夫(A.S.M. Ali Ashraf)以阿富汗战争为例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他首先区分了联合阵线中的三种责任形式:外交贡献,即参与和行动相关的会议的情况;参与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参与防御性的维和行动,如经济重建、社会维稳等。阿什拉夫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认为体系层次的动力经国内政治的传递产生不同的责任分摊模式。具体来说,联盟依赖、威胁感知和集体行动三个体系层次的变量影响了国家对联合阵线的参与情况,而国内政治体制、公众舆论和国家军事能力三个单元层次的变量影响了体系变量的效用,最终形成了不同的责任分摊模式。他以阿富汗战争中的英国、德国和巴基斯坦为例检验了自己的理论框架。^③安德鲁·本内特(Andrew Bennet)等人在分析海湾战争中的责任分摊时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他们区分了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的解释路径,前者包括集体行动、威胁制衡和联盟依赖,后者包括国家自主性和国内社会以及官僚政治,每一种路径都能单独进行解释。^④斯蒂芬·塞德曼(Stephen M. Saideman)探究了决定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的军事贡献模式的因素。他指出,阿富汗战争的教训以及“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势力对本国领土的威胁程度共同决定了国家在行动中的军事贡献。^⑤蒂姆·海斯布鲁克(Tim Haesebrouck)则研究了为何一些民主国家参加了针对“伊斯兰国”的空

^① Patrick A. Mello, "Parliamentary Peace or Partisan Politics? Democracies' Participation in the Iraq W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15, No.3, 2012, pp.420-453.

^② Scott Wolford and Emily Hencken Ritter, "National Leaders, Political Secur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Military Coal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0, No.3, 2016, pp.540-551.

^③ A.S.M. Ali Ashraf,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Burden-Sharing: The Case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pp.34-87.

^④ Andrew Bennett et al., "Burden-Sharing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1, 1994, pp.39-75.

^⑤ Stephen M. Saideman, "The Ambivalent Coalition: Doing the Least One Can Do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pp.289-305.

袭,而另一些民主国家没有参加。他认为,威胁认知和维系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是国家参与行动的重要动因,但议会的限制会阻碍国家的参与。^①

参与国军队的行动范围也存在差异,成员国军队在行动过程中会受到本国政府的制约(caveat),即政府会对本国军队在联合阵线中的军事行动范围制定一些限制性条件。^②塞得曼和戴维·奥尔斯瓦尔德(David P. Auerswald)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探究了不同政府在阿富汗战争中给本国军队施加的限制程度不同的原因。他们指出,联合政府会给军事行动制定更多的限制条件,因为决策者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各方难以协调一致,而单一总统制或议会制政府施加的限制则相对较少。此外,决策者个人的经历也会影响限制条件的程度。^③达恩·冯克(Daan Fonck)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党的意识形态和议会介入会影响军队在联合行动中的行动范围,右翼政党倾向于将军队的行动限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内,左翼政党则认为行动应该在人道主义原则的范围之内,而议会的介入会增加对军队行动的限制,因为反对党会趁机施加压力。^④

在一些情况下,成员国甚至可能在行动中途选择退出,即出现联合阵线中的背叛行为(defection)。凯瑟琳·麦金尼斯(Kathleen J. McInnis)分析了国家背叛联合阵线的原因和方式。她指出,联盟政治和国际政治、军事力量、国内政治共同决定国家对联合阵线的贡献,行动过程中不断上升的军事风险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政治风险是国家背叛联合阵线的主要原因,而来自盟友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则决定了背叛的策略。^⑤还有研究表明,联合阵线行动期间的换届选举也会增加国家退出联合阵线的可能性。^⑥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

当前,学界对国家参与军事联合阵线的动因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涉及的解释因素涵盖多个层次;对不同国家在同一行动中的行为差异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尽管如此,既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没有系统思考不同因素间的作用机制。一些定量研究借助统计模型判断出哪些因素的影响更大,另一些

^① Tim Haesebrouck,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ir Strikes against Islamic State: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pp.254-275.

^② Gunnar Fermann and Per Marius Frost-Nielsen, "Conceptualizing Caveats for Political Research: Defining and Measuring National Re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Force during Multinational Military Operation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40, No.1, 2019, p.56.

^③ Stephen M. Saideman and David P. Auerswald, "Comparing Caveats: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s of National Restrictions upon NATO's Mission in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1, 2012, pp.67-84.

^④ Daan Fonck et al., "Parliamentary Involvement, Party Ideology and Majority-Opposition Bargaining: Belgian Participation in Multinational Military Operation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40, No.1, 2019, pp.85-100.

^⑤ Kathleen J. McInnis, *How and Why States Defect from Contemporary Military Coali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⑥ Ulrich Pilster et al., "Political Leadership Changes and the Withdrawal from Military Coalition Operations, 1946-2001,"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16, No.4, 2015, pp.463-483.

定性研究区分了不同层次因素的作用次序,但两者都未能完整地揭示其中的因果机制。第二,将国家对联合阵线的参与和贡献情况进行了分隔。一些研究解释了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原因,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不同国家对行动的贡献情况。实际上,两者往往是由同一个决策过程产出的,其选择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因此,在解释国家对联合阵线的行为选择时,除了考虑参加与否之外,还应当包括做出何种程度的贡献。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同时解释北约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的参与和贡献情况。

三 北约国家行为选择的逻辑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正式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①在国家实力的金字塔上,美国处于最顶端,其他国家即使联合起来也难以对其形成制衡。^② 基于超强的军事实力,美国使用武力的频率也有所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主动挑起多场战争,对地区及全球秩序的稳定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中东地区受害尤其严重,至今仍然处于动乱之中。为了确保行动胜利并增强行动的合法性,美国采取军事联合阵线这种形式开展行动,并得到了一些国家的支持,其中既有其盟友国家,也有非盟友国家。但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北约国家对历次行动的态度及行为选择却存在巨大的差异,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在利比亚战争中,北约15个成员国参与了“联合保护行动”(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13个成员国拒绝参与,几乎各占一半。那么,影响北约国家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美国联盟体系的动态变化,进而理解其战略选择。

(一) 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行为差异

通常而言,国家对联合阵线的行为选择可以分为参与或不参与。以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组建的“自愿者联合阵线”(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为例,参与即作为该联合阵线的成员参加“自由伊拉克行动”(Operation Free Iraq),帮助打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不参与即作为伊拉克战争的第三方旁观者,不参加“自由伊拉克行动”。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一些特定情形中,某些国家虽然没有加入联合阵线,但会碍于盟友关系向联合部队提供援助,此种情况仍然属于不参与;第二,参与并不仅仅意味着支持,支持虽然

^①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1990, pp.23-33.

^②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1999, pp.5-41.

对联合阵线的行动表示认可,但可能只停留于口头而不牵涉具体的行动过程。参与需要对行动做出一定的物质贡献,用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 Rumsfeld)的话说,“自愿者联合阵线”的成员需要提供“从海军和空军基地的使用权、情报和后勤工作到部署作战部队”。^①换言之,参与的判定标准是操作维度而非政治维度。

然而,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在参与的成员国中,不同贡献水平的国家被划为同一个类别。在同一项联合行动中,有的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国家则可能贡献较小。以海湾战争为例,英国派出了42000名作战人员,16艘船舰和58架战机参与行动,德国则仅派出了1个中队的作战人员和7艘船舰,^②两者对行动过程的参与程度以及对胜利的贡献程度显然是不同的,特别是在两国国家实力和地位较为接近的情况下。除此之外,国家是否参与行动以及决定做出多大贡献往往融合在同一个决策过程中。如果只区分为参与和不参与而忽略参与国贡献水平的差异,就无法完整地揭示北约国家行为选择的逻辑。因此,有必要将是否参与和贡献水平差异统一到行为选择的框架中,即在参与的类别下进一步按照贡献水平对其进行区分。

关于参与国在联合阵线中的贡献差异或责任分摊,已经有一些学者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区分和比较。阿什拉夫在考察英国、德国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责任分摊时,将联合阵线中的责任形式区分为外交贡献、参与进攻行动、参与维和行动三种。其中,外交贡献由参与和行动相关的双边或多边会议的情况决定,参与进攻行动和参与维和行动则是行动类型上的区分。^③安德鲁·本内特(Andrew Bennet)等在分析英国、埃及、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责任分摊时,将贡献类型分为军事贡献和经济贡献两种,并对不同国家的贡献差异进行比较。^④

既有的区分方式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按照阿什拉夫的界定,外交贡献的目标是通过和平方式协调争端和处理危机,而组建联合阵线则是以武力手段实现目标,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外交贡献不适宜作为联合阵线中的责任分摊形式。其二,不论是阿什拉夫还是本内特等人的分类方式,都是对不同国家的贡献进行横向比较,忽略了国家实力的差异。考虑到实力对比的差距,大国贡献大于小国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参与行动的意愿更强。以本内特等人的分类方式为例,如果单纯考虑军

^① Srdjan Vucetic, “Bound to Follow? The Anglosphere and US-Led 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 1950-2001,” p.33.

^② Andrew Bennett et al., “Burden-Sharing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pp.53-70; Joseph P. Englehardt,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A Chronology and Troop List for the 1990-1991 Persian Gulf Crisis,” SSI Special Report, 1991.

^③ A.S.M. Ali Ashraf,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Burden-Sharing: The Case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pp.29-33.

^④ Andrew Bennett et al., “Burden-Sharing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pp.48-70.

事贡献和经济贡献的绝对数量,大国通常大于小国。但从相对数量来看,大国的贡献数量虽大,占自身资源总量的比重却可能很小;小国的贡献数量虽小,但占其资源总量的比重可能较大。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投入的资源占其总量的比重更大,意味着该国对此次行动的重视程度更高,说明其积极性更强。由此可见,以自身国力作为参照,对贡献水平进行纵向比较而非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更能反映出国家参与行动的意愿,进而有助于分析其行为选择的逻辑。但由于不同行动面临的客观限制性条件不同,以贡献类型(军事贡献和经济贡献)作为贡献水平的指标相比贡献方式(如外交贡献、参与进攻行动、参与维和行动)而言更为恰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行为选择区分为三种类型:贡献与国力相符,即强贡献;贡献小于国力,即弱贡献;不参与。在理想情况下,贡献水平与综合实力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由于国家预期投入一场军事行动的资源有限,两者的比值往往存在一个预期值。但是,国家的决策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国家的贡献水平有时候会低于预期值。本文对参与国的贡献水平与其国力的对照关系主要进行经验上的判断,将同一行动中与其国力相当的国家的贡献水平,以及该国在不同行动中的贡献水平作为参照。此外,本文讨论的军事联合阵线均由美国主导,因此美国的贡献水平以及美国对特定国家贡献水平的预期也是判断的重要依据。总体而言,当一国贡献水平占资源总量的比值达到预期值时,则为强贡献;当比值小于预期值时,则为弱贡献。由于军事联合阵线以对行动对象实施军事打击为目标,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相比提供经济援助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军事贡献的重要程度高于经济贡献。鉴于此,本文主要将部署作战部队的情况作为贡献水平的指标,包括作战人员、舰船以及战机的数量等,辅之以军事基地使用权、经济援助等其他指标。从逻辑上看,贡献水平与国家实力的比值存在三种情况:高于、等于或低于预期值。本文将比值高于预期值的情况并入强贡献这一取值中,一方面因为理性的国家通常不会以超出本国实力允许的方式来为联合阵线行动做贡献;另一方面,只要国家做出了特定的贡献,说明其国力足以支撑其行动。

(二)行为选择的驱动因素

基于理性选择以及美国组建联合阵线的基本特征,本文提出,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的地位追求以及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共同决定了北约国家对联合阵线的行为选择。

首先是全球层次的地位追求,包括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参与联合阵线在一定程度上是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际规范的表现,有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声誉。军事联合阵线是集体性的国际行动,通常不会对成员资格进行限定,其成立宗旨至少在名义上是与世界正义相符的,如打击侵略者、保护人权等。从这个角度看,对国际声誉的考虑

会成为推动北约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原因。然而,主导国也可能打着维护世界正义的幌子来拓展其私利,因此判断一项联合行动是否正义不能简单以名义上的口号为依据,而需要更加权威的机构进行裁决。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联合国安理会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授权使用武力的权威机构。事实上,《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明确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①即宪章允许会员国在没有得到安理会授权的前提下行使自卫权。但是由于国家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总是倾向于扩大自卫权的概念和范围,以便为其使用武力寻找合法性基础,因此在国际实践过程中,各国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即承认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权威性,并在使用武力前都积极寻求安理会授权。^② 军事联合阵线的行动涉及使用武力,同样需要争取安理会的授权。获得安理会授权的行动通常被认为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参与此类行动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全球层次的声誉和地位,因此更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与之相反,如果一项行动始终未得到安理会授权,参与该行动将对国家的声誉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有一点需要说明,一般情况下,没有得到安理会授权的行动通常不符合正义;但不符合正义的行动有时候可能会得到安理会授权,这是因为具体行动由国家执行,国家可能超越安理会授权的范围采取行动,美、法、英等国主导的联合部队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行动就符合这一情形。这种情况下,参与行动如何影响声誉取决于国家如何看待行动的本质。

为了巩固和提升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北约国家也可能选择参与联合阵线。美国是当下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国际秩序依靠美国的支撑而得以正常运转,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的追随也是追求全球地位的一种形式。通常认为,冷战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强大的国家实力、为数众多的盟友和伙伴、国际制度体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③ 其中,庞大的全球联盟体系是美国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④而北约作为其级别最高的盟友更是重中之重。美国依靠北约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摊成本和风险;反过来,北约国家则需要依赖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北约国家,尤其是实力较弱的国家,不得不维系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以避免遭遇“被抛弃”(abandonment)的联盟困境。^⑤ 当美

① 《联合国宪章》,第7章第51条, <https://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vii/index.html>。

② Erik Voeten,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s Ability to Legitimize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3, 2005, pp.529-533.

③ 刘丰:《联盟与国际秩序》,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4页。

④ 李景治:《美国联盟战略探析》,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50-51页。

⑤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p.466-468.

国计划组建联合阵线介入国际危机时,尽管联盟义务不要求北约国家强制参与,但选择参与的国家无疑将提升自己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让美国相信其作为盟友是可靠的。从长远来看,这将为该国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增添有力的筹码。因此,对于盟友地位的追求会成为北约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地区层次中的地位追求。如果安全事件发生的地区对某个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维持和提升其地区影响力,该国可能会选择参与联合行动。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只关注本国领土范围内的要素,而是需要依托于某个具体区域,通常是地理上所处的地区或次地区。安全事件的当事方可能只是特定国家,但其影响往往会外溢至整个地区,因而联合阵线的行动目标和作战空间也聚焦于该地区。出于维护地区地位的目标,国家可能会参与联合阵线。首先,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削弱这个国家的地区影响力,为了防止区域地位的下降,该国可能选择进行介入;其次,联合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解决事件,恢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参与行动的国家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一定的地区威望,而事后的重建进程也为国家渗透势力提供了绝佳的窗口,有助于其区域地位的提升;最后,如果一国长期以来在某个地区享有较高的地位,当这一地区发生安全事件时,若该国不积极介入,将会被视为不负责任,其地位与作用也会受到削弱。

最后是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对联合阵线的行为选择涉及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国内政治因素会发挥重要作用。北约成员国自我定位为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发挥作用:其一,公共舆论对参与行动的支持率。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由普通民众经过选举产生,其合法性及权威性来自民众的支持,因此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态度,特别是在使用武力这一敏感议题上。如果国内社会舆论反对参与联合行动,政府通常会拒绝参与或最多通过幕后形式提供有限援助,因为一旦违背了民众的意愿,可能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受到惩罚。其二,议会限制。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政府的重大决策需要经过议会批准才能实现。议会中的各个党派有着不同的政策目标,在具体事件中支持的方案也不同。即使政府表现出参与联合阵线的强烈意愿,但如果在议会中面临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也可能无法按照初始的计划参与行动。

北约国家对联合阵线的行为选择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做出的,各因素的正反效应共同决定了国家的参与情况和贡献水平。理论上,安全威胁同样会对国家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既有研究对此也有充分论述。但在现实中,美国主导的多数军事联合行动均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之外,而且目前看来,这两个地区在可见的未来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安全危机。由此可以推断,安全威胁在多数情况下对绝大多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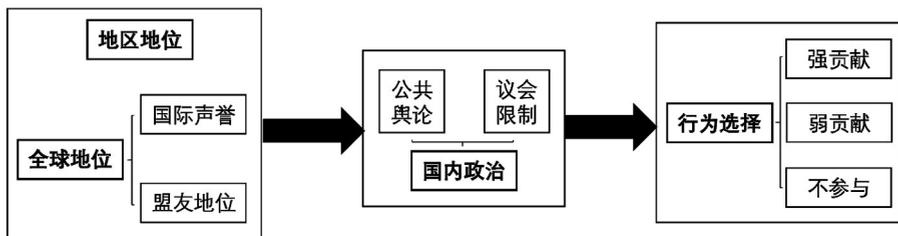
约国家影响不大。土耳其是唯一的例外,作为北约唯一处于中东地区的成员国,土耳其周边经常爆发冲突和安全危机,因此在土耳其的案例中,本文会对安全威胁的影响进行简要论述。

(三)行为选择的因果逻辑

考虑到研究议题的特征和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拟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厘清解释变量的作用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是“体系激励+国内影响”,其中体系因素是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深层原因,而国内因素会影响这一作用过程,要么对体系因素的作用进行传导,要么增强或削弱甚至反转该因素的作用。^① 北约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的行为选择包括强贡献、弱贡献和不参与三种。对全球地位和地区地位的追求是决定选择的深层因素,国内政治因素则会影响决策的过程。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在全球层次对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的追求会发生冲突,如当安理会未授权使用武力时,参与联合行动会削弱其国际声誉,但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美国的盟友地位。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国家优先选择何者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国家的战略传统。有的国家,尤其是传统大国重视国际声誉,因此看重行动本身的正义性;有的国家则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放在首位,即使安理会不授权,这类国家也可能参与行动。其二,是否对美国存在短期需求,如果一国在国内或国际其他议题中急需得到美国的支持,那么该国可能将参与行动作为展现其可靠盟友形象的机会,以换取美国在其他议题中的支持。当参与行动同时有助于提升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时,国家将选择参与;而当参与行动有助于提升盟友地位但对国际声誉起反作用时,国家将基于上述两个要素进行选择。

图1 因果机制传导过程



注:图由作者自制。

^①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26页。

从收益的角度看,地区地位的提升意味着对地区国家影响力的提升。对于国家来说,能够引导甚至控制其他国家的决策过程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最佳方式,而这一过程所依赖的就是影响力。^①影响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国家间交往的方方面面,而安全事件的发生为国家渗透地区影响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因此,本文将地区地位的重要性置于全球地位之上,当发生冲突时,国家将优先关注地区地位的变化情况。当然,对于某个特定国家而言,并非所有地区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联合行动的目标地区对该国的战略意义有限,其是否参与将由其他因素决定。

在国内政治反对势力较弱的情况下,国家的选择主要由对两种地位的追求决定。当地区地位的作用方向与全球地位一致时,国家的行为选择较为明确。具体来说,如果参与联合行动在能够增强地区地位或对地区地位无明显影响的同时,有助于提升全球地位,国家通常会选择参与并做出符合国力的贡献;如果参与行动在削弱地区地位或对地区地位无明显影响的同时,会降低全球地位,国家通常会选择拒绝参与。如果两者方向不一致,国家将优先关注地区地位的变化情况,并以此决定是否参与行动。如果行动有助于提升其地区地位而降低全球地位,国家将选择参与并积极贡献;反之,如果行动会降低地区地位,但有助于全球地位的提升,国家将选择不参与或仅做较低程度的贡献。

在国内政治反对势力较强的情况下,国家的选择可能会被削弱,主要表现为,当对两种地位的追求要求国家做出强贡献时,国内政治的阻碍可能迫使其削减贡献水平甚至不参与联合阵线。

表1 北约国家对美国发起的海外军事行为的行为选择

国内政治反对势力弱		全球地位	
		提升	降低
地区地位	提升	强贡献	强贡献
	降低	弱贡献/不参与	不参与
	无明显影响	强贡献	不参与
国内政治反对势力强		全球地位	
		提升	降低
地区地位	提升	弱贡献	弱贡献
	降低	弱贡献/不参与	不参与
	无明显影响	弱贡献/不参与	不参与

注:表由作者自制。

^① Evelyn Goh, ed., *Rising China's Influence in Developing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Introduction".

本文采取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法国、德国和土耳其参与利比亚战争的情况作为主要案例,结合其他北约国家的参与情况和贡献情况,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冷战结束后,美国以构建联合阵线的形式发起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海湾战争、干涉索马里、干涉海地、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叙利亚战争。之所以选择单一案例,主要是为了控制国际环境和联合行动的性质对国家行为选择的影响。而之所以选择利比亚战争,首先因为时间上较近,资料更容易获取;其次,已有文献对这场战争中的联合阵线研究相对较少;最后,这场战争中涉及的国家战略考量更为复杂,有助于检验本文的理论框架。选择法国、德国和土耳其三个国家则是采用了案例选择方法中的多变案例法,即体现出因变量上的全部变化,^①法国的取值为强贡献,德国为不参与,土耳其为弱贡献。

表 2 北约国家对四场重要战争的参与情况

	参与	未参与
海湾战争	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美国、英国	冰岛、卢森堡
科索沃战争	加拿大、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挪威、丹麦、土耳其、美国、英国	冰岛、卢森堡、荷兰、希腊、匈牙利、波兰、捷克
伊拉克战争	保加利亚、捷克、丹麦、爱沙尼亚、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土耳其、英国、美国	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希腊、卢森堡、斯洛文尼亚
利比亚战争	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罗马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美国	阿尔巴尼亚、捷克、爱沙尼亚、德国、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资料来源:Joseph P. Englehardt,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A Chronology and Troop List for the 1990-1991 Persian Gulf Crisis," SSI Special Report; Bradley F. Podliska, *Acting Alone: A Scientific Study of American Hegemony and Unilateral Use-of-Force Decision Making*, Lexington Books, pp.148-149; Randall Newnham, "'Coalition of the Bribe and Bullied?' U.S. Economic Linkage and the Iraq War Coalition," p.184; Atsushi Tago, "Why Do States Join US-Led Military Coalitions? The Compulsion of the Coalition's Missions and Legitimacy," p.190; 李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的运用》,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8页。

^① [美]约翰·吉尔林:《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黄海涛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75页。

四 北约国家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行为选择

利比亚战争是冷战后西方国家首次在非洲大陆发动的地区战争。这场战争的主要作战任务由英法等国承担,美国仅在2011年3月中下旬摧毁利比亚防控体系的作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余时间退居次席,^①这也导致此次行动的参与国数量远低于此前的联合阵线。^②但在政治意义上而言,联合阵线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多数参与国是在美国的号召下才决定参与行动,英国作为行动的主要贡献国也接受美国的领导。

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班加西爆发反政府游行示威,并迅速蔓延至全国。2月18日,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开始向政府军发动进攻,并控制了班加西的大部分地区。19日,政府军进行反攻,内战逐渐升级。由于卡扎菲政府采取暴力的手段镇压示威群众,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当局进行了强烈谴责,要求其停止暴力镇压,并承担保护平民的责任。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970号决议,决定对卡扎菲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并冻结其家族的财产,对其本人及亲属实施全球旅游禁令。^③但这并未阻止卡扎菲的进一步行动,利比亚内战持续发酵,其国内的人权状况也急剧恶化。3月3日,国际刑事法院确认卡扎菲触犯了反人类罪。3月17日,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授权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境内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④3月19日,美、英、法等北约国家在安理会的授权下,对利比亚发动了“奥德赛黎明”行动(Operation Odyssey Dawn),利比亚战争正式爆发。

利比亚战争的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月19日至30日的“奥德赛黎明”行动,这一阶段的作战任务主要由美、英、法三个国家执行,一共对利比亚政府军发动了六轮空袭,扭转了此前反政府军的不利局势。第二阶段是3月31日至8月19日,北约接过了利比亚行动的指挥权,行动代号改为“联合保护”(Unified Protector),参与行动的国家也扩展为19个,增加了部分北约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与此同时,美国逐渐减少了对行动的参与,于4月2日宣布退出对利比亚的空袭。4月5日,利比亚政府军表示愿意与国际社会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但前提是卡扎菲继续执政。然

① 李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的运用》,第106页。

② Josh Rogin, "Why Obama's Libya War Coalition is the Smallest in Decades," March 25,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3/25/why-obamas-libya-war-coalition-is-the-smallest-in-decades/>.

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0(201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S/RES/1970\(2011\)](https://undocs.org/zh/S/RES/1970(2011))。

④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3(201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S/RES/1973\(2011\)](https://undocs.org/zh/S/RES/1973(2011))。

而,西方国家的战争目标已经不仅仅是保护平民和推动利比亚改革,而是颠覆卡扎菲政权。^①在联合部队和反政府军的猛烈攻势下,政府军节节败退。反政府军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向首都的黎波里推进。第三阶段是8月20日至10月31日,反政府军在联合部队的协助下占领了的黎波里,并于10月20日消灭了卡扎菲。10月31日,北约秘书长在的黎波里宣布,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结束。^②

利比亚战争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人权,也获得了安理会的授权,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从形式上看,联合部队的行动超越了“保护的责任”的限度。“保护的责任”于2001年提出,在2005年联合国首脑峰会上得到各国领导人的认可,被写入《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这一理念强调:“如果和平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有关国家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国际社会应当“及时、果断地采取集体行动”。^③利比亚战争是这一理念的首次实践,但结果并不理想。由于没有相关的执行机制,并且对于国家的具体行动也缺乏约束,这导致西方国家在实践中远远超越了“保护的责任”涵盖的范围。事实上,西方国家的首要目的是推动利比亚的政权更迭,并且客观上加重了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显然与“保护的责任”的本意背道而驰。

从本质上看,利比亚战争的背后是西方各国的战略考量。对美国而言,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无疑将增加其军事负担,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维持其地区和国际领导权。^④综合考虑之下,美国决定扮演“幕后领导”的角色。北约其他国家也都基于自身的战略谋划做出了选择:法国、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挪威、丹麦、荷兰、希腊、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派出作战或保障兵力参与行动;^⑤德国始终反对军事干涉;土耳其一开始坚决反对动用武力,但之后决定派出部分军队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其他北约小国没有明确的立场,最后也没有参与联合阵线。

(一)法国的强贡献

法国是军事干预利比亚的积极推动者,也是重要贡献者。法国在利比亚战争中投

^① Alan J. Kuperman, “A Mode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assessing NATO’s Libya Campaig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8, No.1, 2013, pp.113-116.

^② 详细进程参见“Timeline: Libyan Civil War (February 15–October 20, 2011),” October 15, 2011, <https://globalnews.ca/news/168180/timeline-libyan-civil-war-february-15-october-20-2011/>.

^③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https://www.un.org/chinese/ga/60/docs/ares60_4.htm.

^④ 阎学通:《奥巴马发动利比亚战争的动因》,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5页。

^⑤ 李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的运用》,第108页。

入4200名作战人员、22艘船舰和超过40架战机。^①并且,相比美国前期参与军事打击行动、后期主要提供后勤保障,法国一直承担前线的作战任务,对利比亚的首次空袭就是法国发动的,比美国和英国早了6个小时,^②而且承担了利比亚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飞行任务和三分之一的打击任务。^③同时,法国在外交上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它是第一个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的西方国家,在2011年3月10日正式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建立的临时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并在3月1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呼吁各国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并考虑进行军事干预。

尽管法国的主战立场与美国和英国一致,但在行动框架上却存在分歧。英国和美国认为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国均为北约核心国家,因此应该由北约领导行动。但法国却不认同,其外交部发言人在3月18日明确表示:“北约领导的行动不适用于利比亚的现状。”^④法国方面认为,由北约领导会使行动带有过多的西方色彩,从而落人口实;而且,由于北约内部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反对军事干预,因此会影响作战部署,降低作战效率。此外,北约领导也会将阿联酋、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排除在外。^⑤最终,在多方面的妥协下,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同意由北约从3月31日开始接管行动的指挥权。^⑥

法国参与利比亚军事行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地区地位、国际声誉和国内政治。在地区层次上,第一,挽回在“阿拉伯之春”中遭受的政治和外交上的失败,进而巩固和提升地区影响力。“阿拉伯之春”于2010年12月在突尼斯最先发起,虽然法国曾是突尼斯的宗主国,但当“茉莉花革命”爆发时,法国并未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反应,最终导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Ben Ali)政权倒台。讽刺的是,当突尼斯民众参加游行示威时,法国外长米谢勒·阿利奥-玛丽(Madame Michèle Alliot-Marie)正在突尼斯度假,这也招致国内舆论的强烈抨击。^⑦此后的埃及革命同样让法国措手不及,

① Adrian Johnson and Saqeb Mueen, eds., *Short War, Long Shadow: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gacies of the 2011 Libya Campaign*, RUSI, 2012, pp.ix-x.

② Alastair Cameron, “The Channel Axis: France, the UK and NATO,” in Adrian Johnson and Saqeb Mueen, eds., *Short War, Long Shadow: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gacies of the 2011 Libya Campaign*, p.20.

③ “欧盟与利比亚战争”课题组:《欧盟与利比亚战争》,载周弘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④ Camille Grand, “The French Experience: Sarkozy’s War?” in Karl P. Mueller et al., eds., *Precision and Purpose: Airpower in the Libyan Civil War*, Rand Corporation, 2015, p.188.

⑤ Ibid., pp.188-189.

⑥ “Libya: US, France Agree on NATO Role,” March 23, 2011, <https://www.sanews.gov.za/africa/libya-us-france-agree-nato-role>.

⑦ François Heisbourg, “The War in Libya: The Political Rationale for France,” in Dag Henriksen and Ann Karin Larsen, eds., *Political Rationale and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Lib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29-30.

导致总统穆罕默德·穆巴拉克下台。由于本·阿里政府和穆巴拉克政府是法国在地中海地区重要的伙伴,它们的倒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国的地区影响力。北非向来是法国的“后院”,该地区的稳定对法国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当利比亚危机发生时,法国吸取此前的教训,迅速做出反应,以巩固和提升地区影响力。由于美国当时正受困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法国也希望借机证明其有能力独立应对地区安全危机,进而强化法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①

第二,推进欧盟的“南下战略”。从欧盟内部来看,德法两国是欧盟的核心成员,但双方在欧盟的发展战略上具有明显的分歧。德国支持“东进”,将中东欧国家纳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而法国则支持“南下”,因为法国在北非地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法国积极推动建立同时涵盖 27 个欧盟成员国和 12 个地中海国家的“地中海联盟”,但该计划遭到卡扎菲的强烈抵制,他拒绝出席 2009 年巴黎首届地中海国家峰会,并多次指责该计划破坏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团结。^②为了“重返非洲”,同时提升在欧盟和北非地区的影响力,法国必须铲除卡扎菲,而利比亚危机为法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因此法国积极推进军事干涉。

在全球层次上,承担保护人权的大国责任。在利比亚危机中,卡扎菲政府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示威游行的民众,造成大量平民死伤,被国际刑事法院认定犯下了反人类罪。从法国的视角来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打着“保护利比亚民众”的旗号显然有助于提升其大国声望。对于此前的波黑战争,萨科齐就曾指出,在波黑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是由于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没有及时采取行动。^③在利比亚战争发生后,他指出:“我不希望在历史上留下‘大屠杀同谋’的名声”。^④基于大国道义以及避免重蹈波黑战争的覆辙,法国在利比亚危机爆发之初就积极推动联合国进行干涉,并最终参与军事干涉行动。

在国内层面,萨科齐选举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选择。在支持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下,萨科齐希望通过利比亚战争为其赢得声誉。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行动前法国民众曾表示反对军事干预,但由于法国总统历来在外交上容易获得民意的支持,特别是萨科齐反对伊拉克战争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社会信任的根基,因此当萨科

^① Camille Grand, “The French Experience: Sarkozy’s War?” p.184.

^② 《法国呼吁地中海沿岸国家积极参加巴黎首脑会议》,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6/23/content_15872582.htm。

^③ François Heisbourg, “The War in Libya: The Political Rationale for France,” pp.28–29.

^④ Julien Theron, “French Foreign Policy in Libya and Syria (2003–2017): Strategic Adaptability in Quickly Changing Environments,” in Cenap Çakmak and Ali Onur Özçelik, eds.,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the Arab Spr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217.

齐决定动武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支持利比亚战争,^①这实际上反映出萨科齐面临的国内阻碍较小。

总体上,对于地区地位的关注是法国介入的首要原因,而通过保障人权、维护国际规范带来的国际声誉的提升也推动了法国政府进行积极干涉。不过,考虑到在具体行动过程中,联合部队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人道主义的范畴,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法国参与行动的核心动因是地区地位。但安理会的授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国彰显大国形象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盟友地位和国际声誉的作用方向保持一致。国内政治上,尽管民众舆论曾表示过反对,但并未持续太久,甚至在之后发生了反转,表明国内反对势力较弱。

(二) 德国的不参与

德国对军事干涉利比亚持反对态度,没有参与“奥德赛黎明”行动和“联合保护”行动。实际上,德国支持按照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的安排对利比亚进行制裁,同时也支持卡扎菲下台,但认为应当通过政治途径而非动用武力来处理利比亚危机。在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的投票中,德国没有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站在一起,而是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一道投了弃权票,这也引起了其盟国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德国并未改变自己的立场,在2011年3月29日召开的伦敦利比亚国际会议上,德国外交部长吉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明确表示:“利比亚问题只能以政治方式加以解决,我们必须让问题回到政治的轨道上来”。^②虽然德国未派出部队参与联合阵线,但仍然通过其他方式支持盟国的行动,包括允许美国使用德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以及在阿富汗投入空中预警机,以确保更多的北约军事力量参与利比亚行动等。^③

关于拒绝参与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原因,德国方面曾做出过解释。在投弃权票的当天,德国驻联合国大使彼得·魏蒂格(Peter Wittig)发表讲话称,利比亚战争将会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并且一旦战争未按计划发展,可能蔓延至其他地区,形成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这些潜在的风险是德国拒绝投入兵力参与行动的主要原因。^④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进一步解释称:“我们计算过风险,我认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

① 丁一凡:《法国为何要积极推翻卡扎菲政权?》,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6-7页。

② 《德外长强调德国不参加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4-01/2947123.shtml>。

③ 闫瑾:《德国利比亚危机政策分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12页。

④ Peter Wittig, “Explanation of Vote by Ambassador Wittig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on Libya,” http://www.new-york-un.diplo.de/Vertretung/newyorkvn/en/__pr/Speeches/PM__2011/20110317_20Explanation_20of_20vote_20-20Libya.html?archive=2984642。

拒绝参与行动”“阿拉伯联盟已经对此进行了批评”,反对军事干预“不意味着我们同情卡扎菲,而是因为我们计算过风险”。^① 虽然德国口头上以风险为由拒绝行动,但实际上,德国的选择是地区地位和国内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地区层次,干涉利比亚会强化法国在欧盟的影响力,削弱德国的力量。上文提到,德法两国对欧盟的发展方向存在争议,德国支持“东进”,法国则支持“南下”。对德国来说,军事干涉利比亚非但不会增加自己的收益,反而有助于提升法国而弱化德国在欧盟中的作用。^② 因此,基于相对收益的考虑,德国选择不参与行动。

在国内层次,德国国内各方势力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公共舆论反对干涉。德国前外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曾公开表示,德国投弃权票将降低其国际影响力,并削弱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甚至会破坏德国争取安理会永久席位的努力。^③ 德国各个政党对于是否应该在安理会第 1973 号决议案上投弃权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绿党认为德国应该与其盟友站在一起,支持 1973 号决议的实施;德国左翼党则认为,德国支持其盟友的方式不只有出动军队一种。^④ 在公众舆论层面,民调显示,56%-65%的德国民众支持不参与干涉。^⑤ 由于 2011 年是德国“超级选举年”,而在此前已经举行选举的 5 个州中,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韦斯特韦勒领导的执政联盟得票情况不够理想,因此需要在利比亚危机这一重大事件上顺应民意,拉选票。^⑥

在全球层次上,德国始终坚持按照安理会决议、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应对利比亚危机。虽然没有参与联合行动,但德国对利比亚提供了约 700 万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安置和救助难民。^⑦ 考虑到安理会授权的行动范围仅为人道主义保护,而联合部队的行动带有干涉内政的性质,因此德国的选择仍然与维护国际声誉的预期相符。而在联盟关系上,德国的行为显然冲击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不仅表现为拒绝参与行动,更因为德国在安理会投票中公然与传统盟友站在了不同的阵营。自统一以

^① Simon Tisdall, “Libya: Reaction: Britain and France Appear Ever More Isolated as World Opinion Turns Hostile; China, Russia, Germany, Brazil Voice Objections NATO Also Divided as Turkey Blocks Agreement,” *The Guardian*, March 22, 2011, p.6.

^② 刘原媛:《利比亚战争背后的欧盟领导权之争》,载《世界知识》,2011 年第 20 期,第 41 页。

^③ “Fischer Joins Criticism of German Security Council Abstention,”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0,1518,752542,00.html>.

^④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Libya Crisis,” *German Politics*, Vol.21, No.4, 2012, pp. 398-400.

^⑤ “Europe’s Libya Intervention: Germany and Russia,” <http://americankafir.wordpress.com/2011/03/29/europe-libya-intervention-germany-and-russia/>.

^⑥ 闫瑾:《德国利比亚危机政策分析》,第 12 页。

^⑦ 同上文,第 11 页。

来,德国历届领导人都怀抱重振大国地位的雄心,希望能够改变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的形象,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①对德国来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立于美国的作用是其长期的战略目标,德国需要借此展示其大国的身份。基于此,德国在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中更加重视前者。

对地区地位和国际声誉的关注推动德国拒绝参与联合行动,民众的反战情绪则进一步巩固了德国的政策立场。实际上,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在德国的决策过程中更加明显。在大选之际,公共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高于任何时期,基于理性计算的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的政策都以竞选目标为导向,为了争取选票,领导人通常不会逆民意而采取行动。

(三)土耳其的弱贡献

在“奥德赛黎明”行动正式开始前,土耳其坚决反对针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行动,同时反对北约介入利比亚危机,埃尔多安总理明确表态:“军事干预利比亚会导致危险的结果”。^②土耳其的反战立场实际上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军事干预会加剧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其次,利比亚是土耳其承包商的第二大海外市场,对利比亚动武会损害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并且利比亚有约25000名建筑工人来自土耳其,土耳其政府需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再次,由于土耳其距离利比亚不远,军事干预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后果会波及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如难民潮、恐怖主义等;^③最后,由于西方国家干涉的目的是推翻卡扎菲政权,土耳其担心遭受军事干预后的利比亚会重蹈伊拉克的覆辙,正如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所言:“联合部队的目标不是解放利比亚民众,而是有潜在的利益,我担心在伊拉克发生的事会在利比亚重现”。^④

而当行动正式开始后,土耳其政府却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最终参与了北约主导的军事行动,但强调不会参与利比亚行动中的作战任务,只承担人道主义援助任务,并表示北约的行动应当符合国际规范和联合国宗旨。土耳其外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表态称,北约应当利用其力量防止卡扎菲迫害利比亚民众,并促成

① 张健:《德法特殊关系:变化与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第33页。

② Emily O'Brien et al., *The Libya War: A Diplomatic History*,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11, p.8.

③ Bilgin Ayata,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Arab World: Rise and Fall of a Regional Actor?”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7, No.1, 2015, pp.100-101; Ryan C. Hendrickson, “The Role and Impact on NATO,” in Dag Henriksen and Ann Karin Larssen, eds., *Political Rationale and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Lib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18.

④ “Wary of France, Turkey Wants NATO in Charge of Libya,” *Today's Zaman*, March 25, 2011.

停火。^① 土耳其议会 3 月 24 日通过决议,允许政府依据第 1970 号和第 1973 号决议派遣陆军、空军和海军参与利比亚行动。3 月 27 日,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将直接承担 3 项人道主义援助任务。^② 土耳其在利比亚战争中仅贡献了 4 艘护卫舰、1 艘潜艇、1 艘后勤援助船和 6 架 F-16 战机,并开放军事基地作为北约盟军空军军事司令部,没有派出地面作战部队,^③远远少于海湾战争中的 120000 名作战人员、2 艘船舰和 3 个空军作战中队。^④ 而且,土耳其未参与任何作战行动,因此其贡献显然是低程度的。

土耳其政府之所以改变立场,其前提是联合行动的安全威胁程度较弱。“奥德赛黎明”行动对土耳其的安全威胁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由于土耳其与利比亚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显然会损害土耳其经济利益。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使土耳其的领土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需要得到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支持,并且一旦战争胜利,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可能会独立为一个新的国家,这将严重激化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民族分裂势力,进而威胁土耳其主权和领土完整。^⑤ 相比领土和主权安全,土耳其在利比亚战争中面临的经济威胁显然无法单独决定其行为选择。

在安全威胁较弱的情况下,土耳其的选择主要基于对地区地位的考虑。由于短期内无法加入欧盟,土耳其试图趁机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加入欧盟就是土耳其最大的外交战略目标。为此,土耳其以欧盟标准为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并于 2010 年 10 月通过了修宪议案。^⑥ 但欧盟内部对此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法国一直持反对意见,使得土耳其对法国颇为不满。2011 年 3 月 19 日举行的利比亚问题巴黎峰会上,法国没有邀请土耳其参加,之后萨科齐总统访问土耳其期间也仅逗留了 5 个小时,这使土耳其感觉没有受到尊重,两国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在谈到军事干预利比亚时,埃尔多安影射法国是为经济利益而主张动武,他表示:“我

^① “NATO Can ‘Pressure’ Gaddafi into Libya Truce-Turkey,” <https://af.reuters.com/article/commoditiesNews/idAFILDE72S05F20110329>.

^② “Turkey to Assume Control of Benghazi Airport in Libya,” *Hurriyet Daily News & Economic Review*, March 28, 2011.

^③ Adrian Johnson and Saqeb Mueen, *Short War, Long Shadow: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gacies of the 2011 Libya Campaign*, p.xi.

^④ Joseph P. Englehardt,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A Chronology and Troop List for the 1990-1991 Persian Gulf Crisis”.

^⑤ Carol Migdalovitz, “Iraq: Turkey, the Deployment of U.S. Forces, and Related Issue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3, pp.6-9.

^⑥ 郑东超:《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1 期,第 38 页。

希望那些只看中利比亚的石油、金矿和地下财富的国家能够以良知看待目前的局势”。^① 考虑到短期内法国不太可能改变对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态度,土耳其转而更加关注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对他的看法,^②因此决定在利比亚危机中展现其地区大国的姿态。自冷战结束后,土耳其逐渐摆脱美国对其外交的控制,开始谋求在伊斯兰世界建立领导地位,提升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③ 在法国拒绝北约介入的情况下,土耳其转而支持北约接管行动指挥权,以确保其对地区重大事件的参与。与此同时,土耳其一方面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树立其高速发展的“伊斯兰民主国家”的形象,以强化地区影响力;^④另一方面,作为地区国家,土耳其也希望参与到利比亚的战后规划中,以做出有利于其国家安全的安排。^⑤

对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的关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土耳其坚持在安理会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因此仅派出部队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此外,在法国反对北约介入的情况下,土耳其仅接受北约对行动的指挥权,此举从侧面反映了对盟友地位的重视。尤其对比德国脱离北约框架向利比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土耳其的行为更加表明其重视盟友关系。然而,由于国内舆论明确反对军事干涉利比亚,^⑥土耳其最终仅做出了较弱程度的贡献。

(四)其他国家的行为选择

除上述三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也都以自身战略需求为依据做出了选择。英国是法国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贡献者,派出了 3500 名作战人员、17 艘船舰、超过 40 架战机参与利比亚战争。^⑦ 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在卡扎菲死亡当天的演讲中宣称:“这是纪念所有卡扎菲暴政受害者的一天,利比亚人民有更多机会建立起民主政府。”^⑧在战略意义上,积极推动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是英国长期的战略目标,而推动利比亚向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方向转变符合这一目标,有助于维护其国

① Ian Traynor, “Turkey and France Clash over Libya Air Campaign,” *The Guardian*, March 24, 2011.

② Shashank Joshi, “The Complexity of Arab Support,” in Adrian Johnson and Saqeb Mueen, eds., *Short War, Long Shadow: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gacies of the 2011 Libya Campaign*, p.67.

③ 李小军:《论二战后土耳其中东政策的演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18页。

④ Shashank Joshi, “The Complexity of Arab Support,” p.67.

⑤ Jim Zanotti, “Turkey-U.S. Defense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11, p.9.

⑥ Ryan C. Hendrickson, “The Role and Impact on NATO,” p.218.

⑦ Adrian Johnson and Saqeb Mueen, *Short War, Long Shadow: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gacies of the 2011 Libya Campaign*, p.xi.

⑧ “David Cameron: Remember Colonel Gaddafi Libya Victims,” <https://www.bbc.com/news/uk-15387273>.

际声誉和提升地区地位。^①此外,“英美特殊关系”也是英国接受美国领导的重要原因。在行动正式开始前,卡梅伦就与奥巴马进行协商,双方一起推动北约接管行动的指挥权。在制定“禁飞区”计划的问题上,英国外交大臣威廉·海格(William Hague)也明确表示,英国完全与美国保持一致。^②从国内来看,英国多数民众以及议会在野党也都支持英国政府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③就英国而言,所有因素都推动其积极参与联合行动并做出符合预期的贡献。

作为利比亚的宗主国,意大利在利比亚危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意大利起初并不支持军事干涉利比亚,因为两国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意大利是利比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意大利从利比亚进口的石油占其进口总量的23%,是利比亚的最大石油进口商。^④因此,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一开始明确表示不愿干涉利比亚。但当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第1970号和第1973号决议后,意大利政府决定对卡扎菲采取行动。意大利先后派出4800名人员、近40架战机和16艘船舰,并开放其军事基地,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⑤意大利的选择既是为了支持联合国授权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出于巩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需要。冷战结束以来,意大利一直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视为其赢得国际威望的重要来源。^⑥在利比亚战争中,意大利始终接受美国的领导,在美国宣布撤军之后,意大利认为必须由北约接管行动指挥权,甚至威胁撤销开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⑦这也表明其对盟友地位的重视。从意大利的角度看,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是其参与行动的主要原因;尽管是利比亚的宗主国,但意大利在利比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威望并不高,这表明地区地位对意大利行为选择的影响较小;虽然国内民众以及联合政府的另一个政党在利比亚危机初期反对军事干涉,但在安理会授权后,反对的声音也逐渐弱化。

挪威、加拿大、丹麦等国在决定参与行动时也均表示只接受北约的领导,在美国扮演“幕后领导者”角色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向美国表明其可靠盟友的地位。另外一些未参与行动的国家则将利比亚战争视为非正义的,波兰领导人就曾直接

① “欧盟与利比亚战争”课题组:《欧盟与利比亚战争》,第28-29页。

② “Timeline: UK's Road to Action in Libya,”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1282150>.

③ Ibid.

④ “Relying on Libya: Which Countries are Most Dependent on Libya Oil?”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1/02/25/relying-on-libya>.

⑤ Adrian Johnson and Saqeb Mueen, *Short War, Long Shadow: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gacies of the 2011 Libya Campaign*, p.x.

⑥ Ben Lombardi, “The Berlusconi Government and Intervention in Libya,”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46, No.4, 2011, p.31.

⑦ “Italy Presses for NATO Command of Libya War,” <https://euobserver.com/news/32033>.

指出,北约的军事干涉是受石油利益的驱使。^①

五 结语

冷战后,美国在进行对外军事干涉时热衷于组建联合阵线,借助这种方式来提升战争胜利的可能并降低成本。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北约盟友积极参与并做出重要贡献,有的参与其中却未做出符合美国预期的贡献,还有的甚至拒绝参与行动。通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对地区地位和全球地位的追求是北约国家对联合阵线参与情况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全球地位包括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国内政治因素则会对其作用过程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限制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鉴于土耳其是北约唯一一个处于中东地区的国家,其周边经常性爆发冲突,因此在讨论土耳其的行为选择时,本文纳入了安全威胁这一因素。法国、德国和土耳其等国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行为选择总体上验证了该理论框架的有效性。

研究发现,国家在选择是否参与多边军事行动时,优先关注行动对其地位的影响,这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存在一定出入。现实主义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行为时总是强调物质力量的重要性,例如新现实主义对国家权力的观测就简化为具体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但实际上,如果从权力最原始的概念出发,将其视为一方让另一方做其本来不愿做的事的能力,^②那么地位显然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拥有较高地位的国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近期,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地位的研究逐渐兴起,但多数研究仅关注大国的国际地位,^③而忽视了地位的不同形式以及不同国家对不同地位重视程度的差异,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探讨和跟进。

(作者简介:魏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Amitai Etzioni, "The Lessons of Libya," *Military Review*, Vol.92, No.1, 2012, p.53.

^② 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 Science*, Vol.2, No.3, 1957, pp.202-203.

^③ 如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Xiaoyu Pu, *Rebranding China: 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